

关于张闻天在延安时期的几个问题

李 竹 雪

张闻天同志是在我党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37年底,他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在此期间,党内的一些重要会议大多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由他主持召开的,并起草过一些决议。然而,翻阅党史、革命史、现代史教材,除遵义会议提到他外,其他各次会议几乎没有提到。不仅如此,近来有的文章说,在延安时期,张闻天和王明还是靠在一起的。这就一笔抹杀了张闻天在这一阶段的工作成绩。如何评价延安时期的张闻天,严肃地提到了史学工作者的面前。笔者仅据自己所看到的资料,试图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以就教于史学界。

(一)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35年2月5日,党中央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召开会议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①1937年底,在王明的鼓噪下,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王明、康生进入书记处。从此之后,书记处不再设总负责,张闻天仍是书记处成员之一。1939年2月,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党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为部长。一直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进行调整,他不再任书记处书记止,在这长达8年之中,张闻天先后为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等起草了决议^②,并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等文件,这说明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是很重要的。与此同时,我们党成功地反对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宣布将其开除出党。1936年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主要应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和努力。张闻天当时为党的总负责人,他积极赞助毛泽东、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批判了当时要杀蒋介石的一些同志的错误意见”^③,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在这之前,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关于用“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的改变,都是由他起草经过集体讨论通过的,自然他也是赞同的。可惜的是,在西安事变的各种材料中,在党史教材里,基本上没有反映这一事实。就连影响较大的历史故事片《西安事变》,也只字未提张闻天。对此,热情的观众提出了疑问,该片的编导同志不得不认为这是一件遗憾的事。但是,影片已经拍成,不好更改,因此,在表示歉意的同时,编导者也坦率地说出了他们的顾虑,这就是张闻天曾犯过“左”倾错误,历来的党史、革命史教材都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怕弄不好会影响这部片子,所以也仿照办理。

上面这一事例说明,在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之中,对张闻天的这一段工作,

还不能如实地反映，更谈不上正确的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教导我们党史工作者要写真史，不要写假史。能否如实地反映和评价张闻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关系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坐而论道，应解放思想，正本清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和现实的准绳，也是研究各门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我们认为对于延安时期的张闻天，既要看到他的正确的一面，也要看到他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公正地评价他的功过是非。

第一，张闻天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为紧急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挽救了革命。从此，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被公认，党中央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所以，从领导关系上讲，张闻天负总责，从路线上讲，他执行的乃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而，他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这种关系，表面看来不可思议，实际上却是合乎情理的。怎样才能摆正这种关系，使它既符合党的原则，又不违背历史事实，的确是十分重要的。这里以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会后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报告为例，说明他们的关系。

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党在革命新时期的策略路线。张闻天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集中批判和纠正了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对国内外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党的政策，作了完整透彻的分析，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正准备并吞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亡国灭种的大祸，这个大祸就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决议说：只有组织“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④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根据决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深刻的阐述。很明显，《决议》和报告，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按理说，我们应该以决议为主，以报告为辅，对这一时期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全面论述，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然而，在我们党史教材中至今还很少这样做。目前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写法，基本上有三种：第一种写法，以报告为主、决议为辅，这占绝大多数。如有的教材把报告作为一节来论述，整整用了四页半，而对决议的阐述，仅写了二行半；第二种写法，采取报告和决议合并论述，平分秋色，仅在排列上，决议在前，报告在后；第三种写法，把决议作为重点，报告作为补充，此种占少数⑤。我是同意第三种写法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党实行的是集体领导。每当会议形成决议，它就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共同原则。不管这个决议为谁所草拟，都是带有指令性的文件，任何人的言论和行动都要受其约束。这种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上述第一种写法，是与这一原则不相符合的。第二种写法虽比第一种稍好一些，但主次不分，与党的原则仍有距离。

其次，根据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肯定，但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有时，一个阶级或其政党所作的决定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妥之处，而杰出的领袖人物往往在事后则给予纠正，这在古今中外是不乏其例的。在我党的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的。因此，第三种写法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篇幅先讲决议，用百分之二十的篇幅再讲报告，在讲报告时，只突出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深刻分析”，认为这“对全党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⑥。这样写，既坚持了集体的领导，也突出了领袖的伟大作用，应该说是很恰当的。

延安时期，张闻天主持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据有的老同志回忆，每次会前都要和毛泽东同志商定会议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正是张闻天这个得力助手，才使毛泽东同志能挤出时间从事大量的理论研究，使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得到多方展开而达到成熟。当时曾有人讥讽他跟毛主席太紧了，然而张闻天却严肃地回答：“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⑦。张闻天服从真理，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溢于言表，见诸行动。因此，应该说他与毛泽东同志在政治上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张闻天在思想路线上是拥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的，但他对过去所犯的错误的认识还是有个曲折过程的。“他在延安做过很多报告、讲话，也写过很多文章，都是拥护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个时期，“他的思想作风还没有彻底转变过来。”^⑧也就是说，在政治思想路线上他已经认识到王明推行的一套“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而坚决摒弃它、批判它，但在具体问题上还不见得都认识到了。例如他当时对白区工作的估价就是这种认识的具体表现。

1937年5月至6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会上，刘少奇和张闻天先后作了报告。两个报告，对白区过去工作的评价截然不同。

张闻天认为：过去我们党在白区所犯的许多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贯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在“某些工作方式上”，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的错误”^⑨。他分析犯错误的原因说：“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主张对这种错误“应有确当的估价，不要夸大或缩小，或随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而加以打击”^⑩。从他的发言中看，除了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要随便给“戴大帽子”，加以“打击”这一点是正确的之外，他认为自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在白区的工作方向路线是正确的，错误只是策略和方法问题。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刘少奇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就说：“我们党与群众的全般工作在今后是要执行一个彻底的转变。”他接着说：“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间内，还并没有肃清。因此，它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一切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然而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为了彻底转变党的工作作风，他强调：“必须着重的揭发与批评过去历史传统中的错误。”^⑪

应该说，刘少奇同志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也是尖锐的，这是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张闻天则把党在白区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同广大党员和群众积极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混同起来了，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张闻天后来在实践中也认识到了。

综上所述，我们对张闻天同志这一段工作，既不能拔高，也不应贬低，更不能回避。应站在客观立场上，如实地反映，正确地评价，功归功，过归过，功过分明，秉笔直书，这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应有态度。

(二)

张闻天在延安有十一年时间，他的活动至今不甚被人们所了解，他在党内的作用和地位被回避了，这自然有多种原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党史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延安时期在讨论毛泽东思想时，张闻天始终不表态，说“王稼祥发表了赞颂毛泽东思想的文

章，博古也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但是张闻天，更重要的是王明，在党报上都保持沉默”^⑫。

据笔者所看到的材料，在毛泽东思想提出的过程中，张闻天并非保持沉默，相反，他作了积极的宣传。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也是集体讨论的结果。它的提出有一个酝酿讨论的过程。

1938年9月底，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主持了这次会议。10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时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⑬两天后，张闻天在他的报告中，提出“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他成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认真批判各种不正确的思想”^⑭。张闻天是紧接毛泽东之后，较早一个论述“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年10月，张闻天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抗战第一阶段中国方面：“发动了新的力量，创造了新的人物，新的思想、与新的制度，奠定了新中国的始基”^⑮。无疑，这里说的“新的人物、新的思想、与新的制度”，当然是指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所制定的一整套的战略战术。除此之外，不会是别的什么人的思想。1940年1月，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向大会提出：“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1月下旬，张闻天又在《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一文中，解释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运用的含义。他说：“了解具体情况，也就是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这是运用马列主义于具体环境中，同时也就是发展马列主义。”从他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化已经有了一定的概括的了解。

上述一系列事例说明，在毛泽东思想提出过程的初期，张闻天是作了很大努力的，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他的文章和讲话，白纸黑字，一清二楚。任何人看了都不会得出他对毛泽东思想“保持沉默”的结论。

但是，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说，在这一时期，张闻天的讲话和文章，他的理论活动，虽然都是从事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宣传、解释和论证，然而还“很难说有很多理论上的创见和发展”^⑯。只要我们认真读一读他当时的报告和文章，就不难发现，他的宣传或多或少免不了带有说教式的空洞性。正如他后来讲的：“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老作风，仍然在我的工作中统治着”^⑰。或许由于这种原因，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只能有一定的限度。他深感自己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所以，1941年他听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向中央要求，到农村搞调查研究，补上这一课。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同意了他的要求。从1942年1月起，他先后到晋西北、绥德、米脂等地，走家串户，进行社会调查。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里，收集了大量资料，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小册子，最后写了《出发归来记》，进一步挖了他过去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开始了彻底的转变”^⑱，在这一阶段，他没有写什么文章论述毛泽东思想，这是很自然的事。然而，他对毛泽东的拥护却是不言而喻的。1942年6月底，他正在晋西北搞调查工作，在日寇大扫荡、战争激烈紧张的时刻，张闻天仍然不忘纪念党的生日，歌颂毛泽东领导的正确。他在一次临时召开的纪念会上说：“中国革命二十年来的最大收获和最大成就，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在纪念党的生日时全党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⑲。他在讲话中还对照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所犯的严重错误，表示一定

要汲取教训，告诫后人。张闻天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从不推卸责任。即使一时还认识不到是路线错误，但总在不断的提高，这和王明出尔反尔的态度相比，判若云泥。

“王明是惯于政治投机的野心家，始终把他个人放在第一位，为了夺取和维护他的‘领袖’地位，不惜在党内搞各种阴谋诡计；而张闻天同志则是一个犯了错误的革命者。他把革命放在第一位，把个人放在第二位”^{②③}。他一旦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痛改前非，毫不动摇。他对王明是有认识的，抗日战争初期，当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口号时，“这一次闻天同志对他很警觉，很快就识破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同他划清了界限，并且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反对了王明的机会主义。”^④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也曾说：“王明回来的时候，洛甫是站在我一边的”^⑤。在延安时期，张闻天和王明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如果现在还有人把张闻天和王明相提并论，硬扯在一起，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张闻天也是极不公正的，更不符合党中央1979年8月对张闻天同志的平反昭雪的决定。

1943年7月，纪念党的廿二周年时，王稼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完整的科学概念，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从酝酿到提出的历史过程即将完成。接着，党的一些领导同志纷纷撰文论述毛泽东思想。这中间，没有看到张闻天的文章，这可能就是某些文章所指的对毛泽东思想“保持沉默”的根据吧！从客观上看，这种怀疑似乎有道理，但仔细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又会发现这种怀疑是不足为凭的。

首先，看一个人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要看他在这个时期的一系列言和行，而不能抓住只言片语作结论。我们从张闻天1938年就开始论述毛泽东思想，到1942年纪念党的生日的讲话和1943年所写的《出发归来记》的文章，以及他调查回来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可以说他拥护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一目了然的。

其次，1943年《解放日报》刊登了一些领导同志为纪念党的生日所写的文章，这当然是有选择和代表性的，其中就有博古同志的文章。如果说没有谁的文章，谁就是“保持沉默”，这不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没有事实根据。“毛泽东思想”这一完整概念已经提出来了，张闻天如果没有新的见解，不一定非要在报上发表文章不可。因为表示支持有多种形式，并不局限于某一种形式。因此，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注释：

① 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第26页。

②③④ 吴黎平：《诚恳改正错误，终身追求真理》，见《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⑤⑦⑧ 《怀念张闻天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35页。

④ 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第47、51页。

⑤⑥ 广东高等院校编写：《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上册（修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139页。

⑧⑩⑪ 邓力群同志1982年10月13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见《经济学》周报第47期。

⑨⑫ 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见《六大以来》，第131、144页。

⑬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6、58页。

⑭ 《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24期，第20页。

⑮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0页。

⑯ 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见《六大以来》，第193页。

⑰ 《解放》第五集，第90期。

⑱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

⑲ 马洪等：《回忆张闻天同志的一次重要讲话》。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悼念张闻天同志》一书。